

● “共同富裕”专栏 ●

浙江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与浙江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发展的均衡性较好、民营经济为主体、“五化”联动、“八八战略”指引和良好的政商环境等密切相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和浙江的基础优势

文 / 郭占恒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十四五”发展的新目标、新要求、新战略、新举措。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部署，是赋予浙江的重大使命，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把握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五大关键环节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和系统工程，必须从主体的全民性、内涵的全面性、路径的共建性、过程的渐进性、制度的根本性等五大关键环节，清醒认识和把握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主体的全民性：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或平均数的富裕

西方经济学没有共同富裕的概念，它主要强调按要素分配，劳动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息、土地获得地租、企业获得利润，还有政府获得税收等，这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和本质特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建构的科学。这个科学首先要解决的主体是人而不是要素，主体的人是全体而不是个体或少数。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是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或平均数的富裕。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少，一个地区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全面实现小

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习近平每当讲到共同富裕的时候，都要加上“全体人民”这四个字，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着眼点、出发点、落脚点应该也必须是“全体人民”。

（二）内涵的全面性：共同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而不仅是人均收入的多少

共同富裕不是财富分配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共同富裕固然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这是共同富裕最基本的内容。然而，仅有物质生活的富裕，就会与人的需求相背离，也与现代文明相背离。人的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容，就说明了共同富裕内涵的全面性。

更为全面阐述共同富裕内涵的是习近平2021年1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他说：“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

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由上可见,共同富裕的内容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建设是发展层面,富裕是发展成果的共享层面,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路径的共建性: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共建共享,是共同“做大蛋糕”,而不是简单地去“分蛋糕”

共建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和必由之路。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找到科学的共同富裕道路,而是把共同富裕简单理解为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搞计划经济和平均分配,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大家没有生产积极性,越搞越穷。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至于如何实行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帮助欠发达地区,我国在对口帮扶中探索出的开发式扶贫经验非常具有借鉴性。即:不是简单地送钱送物进行“输血”,搞平均主义分配,而是激发内生动力进行“造血”,不断改善共同富裕的环境和政策,帮助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交通通信设施,发展生产、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建立社保、培养致富带头人等,最后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就是以共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那种主张“同时、同步、同等富裕”的想法,那种“等、靠、要”的想法,那种“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的想法,那种“佛系、躺平、当咸鱼”的想法,都是与共同富裕格格不入的,也是不可取、行不通的。

(四)过程的渐进性: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理想和奋斗目标,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防止“急于求成”

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距今已2500年,马克思提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距今已160多年,新中国探索共同富裕也已经历了70多年,从理想到理论到实践不断推进,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目前还在进行时,以后还有将来时。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定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从客观条件出发,从需要与可能出发。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这深刻阐述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可及性。我们要按照稳中求进、蹄疾步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法则,推动共同富裕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从不均衡到均衡循序渐进。将来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也还需要继续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阶段性目标,没有终结目标。

(五)制度的根本性:建立完善“权力不腐败、资本不垄断”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决定因素,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开辟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但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尚需一系列制度设计和严格执行。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之间存在差别是正常现象,社会公众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有着相当大的宽容度。真正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两条:一是权力寻租,即凭借掌管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家族或小团体的私利,搞特权,搞腐败,强取豪夺大量社会财富。二是资本垄断,即通过金融资本垄断某种或某些商品的生产和市场,规定商品的垄断价格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进而垄断大量社会财富。这两条虽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天然就具有免疫力,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根本杜绝并为之进行长期的斗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执行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大力营造“权力不腐败、资本不垄断”“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法治环境,让每个人享有公平公正的权利和机会,方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优势

为什么是浙江?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对此,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国

内外媒体纷纷关注和热议。“功夫在诗外”。浙江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与浙江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发展的均衡性较好、民营经济为主体、“五化”联动、“八八战略”指引和良好的政商环境等密切相关。

(一)浙江发展以“不等不靠不要”的精神弥补“三缺少”的不足,依靠内生动力,逐渐走上富裕道路

资源、资金、政策通常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在缺少陆域自然资源、缺少国家资金投入、缺少国家区域指向性特殊政策“三缺少”的条件下起步的。但是,浙江人民敏锐地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政策,以“不等不靠不要”的精神,创造弘扬“四千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等系列浙江精神,闯出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特色发展道路,实现了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40年多来,浙江经济总量由全国第12位跃升到第4位,人均GDP由第16位跃升到第6位,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实现了由陆域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再到经济强省的发展变化,实现了由地域局限到对内对外开放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基本小康再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发展变化,创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浙江经验,形成了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这“三个地”的政治优势。

(二)浙江发展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均衡性、稳定性和共享性

浙江虽说经济总量不是全国最大,人均GDP和收入水平也不是全国最高,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更不是全国最好,还存在许多短板弱项,与党中央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与老百姓期待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浙江发展的成长性、均衡性、稳定性和共享性比较好,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

更重要的是,浙江发展对全国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财政贡献看,2020年,浙江财政总收入由1978年的27.45亿元增至12421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1994年的94.6亿元增至2020年的7248亿元,在全国的位次由1994年的第10位升至第3位。从人口就业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浙江常住人口64567588人,十年共增加10140697人,年均增长比上一个10年的1.53%高了0.19个百分点,大大高于全国

10年年均增长0.53%的水平。在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达到2555.75万人,其中省外流入1618.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5.0%,主要来自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和四川等5个省。从对口帮扶看,浙江先后对口帮扶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贵州、湖北、吉林等的贫困地区,其中,“十三五”期间浙江对口帮扶的四川、贵州、湖北、吉林4省80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115.22亿元,动员社会力量捐款赠物32.1亿元。累计选派244名党政干部、9402名专业技术人才到对口帮扶地区挂职开展扶贫协作工作,并组织协调1852家企业到对口帮扶地区投资兴业,实际到位投资达964亿元。从慈善事业看,到2020年底,浙江共有慈善基金会812家,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第3,每百万人拥有基金会数量超过全国每百万人拥有基金会数量1倍多。2020年,浙江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疫情防控,捐赠资金和款物总量除湖北以外居全国第一,其中向对口帮扶地区捐资捐物4.74亿元,直接受益群众181.01万人次。

(三)浙江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民营经济为主体、“五化”联动、“八八战略”指引和良好的政商环境

浙江善于把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紧密结合,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


民营经济为主体,以百万人创业带动千万人就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创造了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台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以外资经济为主的深圳模式,也不同于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民营经济以百万人创业带动千万人就业,成为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和最大资源。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了66%的生产总值、74%的税收、82%的外贸出口、60%的投资、88%的就业岗位和拥有92%的企业。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每8个人中就有1个老板,连续22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量第1。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浙江的就业和居民收入多元化。2020年末,浙江城镇调查失业率均控制在4.5%左右,低于全国;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397元,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占57.4%、15.9%、11.7%和15.1%,也就是说,非工资收入占近一半。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五化”联动,成为浙江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从市场化看,浙江

人以敢闯市场著称,通过市场发现商机,配置资源,增强动能。王小鲁、樊纲等著《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2016年)指出,浙江市场化程度连续多年保持全国领先,2014年上升至第1位。从工业化看,浙江人大多以搞工业、办企业起家,如今实现由纺织、服装、皮革、塑料等日用轻工为主,加快向电气、计算机通信、电子、成套设备、汽车等先进制造业转变,成为工业制造大省。从城市化看,浙江以“兴一个市场、带一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建一个城镇”为特点,城市化加快推进,全省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4.5%,比全国的17.9%还低3.4个百分点,发展到2020年的72.2%,比全国的60%高出12.2个百分点。从信息化看,浙江是最早实施“数字浙江”建设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又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数字经济引领、撬动、赋能作用增强。2016年至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1%,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7.3个百分点,成为浙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从国际化看,浙江较早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互动的格局。实际使用外资从2002年的47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58亿美元,居全国第5位,占全国的比重提升至10.9%。同时,浙江经备案、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631家,境外直接投资本案额110.3亿美元,累计境外投资备案额679亿美元,投资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规模保持全国第4,其中出口规模由全国第11位升至第3位,已连续保持10年。

“八八战略”引领浙江走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精神和浙江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与实践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先进理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也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贯穿于他在浙江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如:200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指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2005年12月22日,习近平在全省民族工作会议暨第三次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2006年6月3日,习近平在浙

商大会上指出:“浙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开拓者,是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贡献者,是浙江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八八战略”从体制机制创新、对内对外开放、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生态省建设、山海协作工程、软硬环境建设、文化大省建设等方面,解决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路”和“桥”问题,推动浙江从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发展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从偏重经济发展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全省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

不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打造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商环境。从“八八战略”提出“切实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到“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数字化改革”,浙江围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打造全国“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政商环境,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活动,不断推动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在前列。从为民办实事看,2004年10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每年聚焦解决群众提出的10件实事,强调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重在办事,成于务实,这一坚守至今已17年。目前,浙江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全国领先。在“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中,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进入前10,其中杭州连续13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被授予“幸福示范标杆城市”。2020年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提升至97.25%,连续17年居全国前列,被认为是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从为企业服务看,2020年8月,为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等9部门,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0+N”便利化行动方案(2.0版),包括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得用水用气、不动产登记、获得信贷、跨境贸易、执行合同、纳税、办理破产、企业注销、知识产权保护、证照分离等涉企改革,其中“开办企业”全流程办理时间将不超过3天。政府服务下沉,能线上不线下,能一次不两次,企业少跑路,群众不跑路,良好的政商环境,是浙江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因,也是吸引外来人口、人才来浙江创业就业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